

认真消除中美贸易摩擦的重要性

胡永泰

一 引言

当《华尔街日报》于 2011 年 4 月 1 日刊登题为“中国会议凸显货币冲突”的报道时，这并不是愚人节的一个玩笑。由于中美双边贸易不平衡对美国金融造成的冲击涉及面已经从美国失业问题（Scott，2007）扩大为美国金融市场的动荡（Guha，2009）。“恶中国”的情绪非常高涨，甚至连《纽约时报》都省去矛盾修辞手法，直接称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为“典型性以邻为壑的竞争性贬值（强调）”。

不仅英语语言在讨论中美经济关系中受了伤害；历史也发生了错误的转折。尼古拉斯·拉迪（Nicholas Lardy）说：“美国是瘾君子。我们沉迷于消费……中国是供应商。他们提供信贷使我们过度消费。”^①

无法忽视的是，19 世纪的鸦片战争就是上述事实的佐证，只不过现在侵略者和受害者二者身份发生扭转，这种历史的转变确实让人始料不及。为了继续尼古拉斯做出的历史类比，我将对卡尔·马克思最著名的作品的第一段进行一段演绎——即中国的理智之光——在 2011 年 4 月探讨世界的状态和我的观点。

① 《温特学院：中美两国成为连体婴》，圣克劳德州立大学供稿，2009 年 3 月 2 日，<http://www.stcloudstate.edu/news/newsrelease/default.asp?storyID=28126>

一个幽灵正困扰着世界——它就是货币战争。20 国集团会议（G20）将在 2011 年 11 月 3 日和 4 日在戛纳聚首，试图通过结成一个圣洁的同盟将这个幽灵驱走：美国的总统，中国共产党总书记，美国财长盖特纳，法国财长拉加德，日本专家和德国夏尔巴人。货币战争由于中美贸易不平衡问题而存在。G20 有没有可能退化成 G2，而中国死守汇率，与其他国家的抗议针锋相对呢？G20 难道不能使出政治手腕，使全球经济复苏，走上可持续发展之路吗？如果中国能与其他 G20 成员达成这样的结果，那么这将是中国和 G20 对全球经济复苏。

二 汇率一元论之外的论调

仅凭美国庞大的贸易逆差和中国庞大的贸易顺差均无法真实反映中国的经济状况。然而，二者能够反映出两国的经济状况（及世界其他地区）（Woo, 2008）。不容置疑的是，由于央行的不断干预，在外汇市场中，人民币的价值被低估了；而另一点不容置疑的是，美国的低储蓄率致使美国借用国外资金投资，填补其庞大的政府财政赤字，而美国政府并没有形成一个可靠的方案，随着经济的复苏来减少预算赤字。直白地说，只有中美双方均采取正确的措施，才能真正实现一个公平减少贸易不平衡的方案。

鉴于贸易不平衡是由一系列因素造成，简单地说，有效的解决方案需要运用多种政策工具。不仅要有人民币兑美元的升值，还要有大的政策上的改变，比如降低中国的贸易壁垒，美国削减预算赤字，美国进出口银行扩大贸易信贷设施等。

颇受好评的“广场协议”（Plaza Accord）（1985 年 9 月签署），使日元大幅升值，但因在全球金融市场中掀起轩然大波，仅 17 个月后，它就重蹈与 1987 年签署的“卢浮宫协议”（Louvre Accord）的覆辙，成为博物馆中的一件展品。随着世界开始走出 2008 ~ 2009 年的全球金融危机，此时向金融市场推崇此类做法是不负责任的。

更重要的是，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大幅升值对降低美国贸易赤字是否有效，是令课本书以外的世界生疑的事。当日元兑美元汇率从 1985 年的

238.5 日元兑 1 美元升至 1988 年的 128.2 日元兑 1 美元（据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增值 86%），对缓解美日间的贸易失衡却收效甚微（见表 1）。美国贸易逆差占国内 GDP 从 3.5% 降至 2.8%（下降 0.7 个百分点），而日本贸易顺差占国内 GDP 从 3.4% 降至 2.6%（下降 0.8 个百分点）。美日贸易不平衡变化最大，所占国内生产总值从 3% 降至 1.6%（下降 1.4 个百分点）。

表 1 1984 ~ 1988 年日元升值期间的美日贸易平衡状况

	日元/美元	美国贸易平衡 (占美国 GDP 百分比)	日本贸易平衡	美日双边贸易平衡
			(占日本 GDP 百分比)	
1984	237.52	-3.13	2.64	2.63
1985	238.54	-3.51	3.43	2.98
1986	168.52	-3.80	4.12	2.60
1987	144.64	-3.61	3.29	2.17
1988	128.15	-2.75	2.61	1.61

资料来源：贸易数据来自纽约联合国国际贸易统计资料库，国内生产总值数据来自华盛顿特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国际金融统计资料库。

1985 年，日本的出口商品在美国市场的售价大幅提高之后，美国贸易赤字没有因此而明显减少。原因如下：首先，美国的客户转而从第三世界国家进口类似产品；其次，为了保住美国市场，日本企业将生产转移到其他亚洲国家进行。由于这些新的海外生产基地从日本引进大量的资本和设备，日本的贸易顺差也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

由于超过 60% 的中国出口商品均产自外资工厂，如果人民币重现 1985 ~ 1988 年间日元升值的场景，许多外国投资者会将生产经营转移到世界其他地区去。如果美国不采取行动提高低储蓄率和削减预算赤字，纵然有第二个“广场协议”，也不会减少美国现有的贸易赤字，并将致使美国将从国外借来的资源进行重新分配，引发新一轮全球金融市场动荡。

均衡汇率的经济学定义是央行不参与的前提下产生的结算汇率。结算汇率以国际收支为零进行定义，而不以双方贸易的账面平衡情况（或当前账面平衡情况）为零定义。这意味着尽管汇率失调是基于基本均衡汇率的概念进行定义的，它也空有其壳，因为基本均衡汇率与结算汇率并不相同。

2011年11月美国财长盖特纳在首尔的G20峰会上提出，每一个G20成员国应该防止贸易不平衡持续超过国民生产总值的4%，这对缓解经济环境不景气下以生产能力低下和全球失业率居高不下为代表的贸易紧张，是切实可行的办法。盖特纳的提案在当前全球形势下，具有良好的经济和政治意义，原因如下：①避免基于均衡汇率理论（FEER）对人民币进行衡量的伪科学及人民币大幅升值和美国贸易赤字大幅下降论调的不科学性；②每个国家自由选择政策工具，使贸易不平衡处于可控状态；③杜绝以邻为壑的政策对缓慢复苏中的国际经济产生破坏性影响。

三 中国应何去何从

中国作为一个发展中的经济体向发达国家提供贷款，这着实是件不寻常的事。特别是当估算均显示中国的资本回报率比美国高得多。这种反常结果导致：①中国在政治和经济上压倒一切的首要任务是为庞大的劳动力队伍创造就业机会；②对稚嫩产业进行保护的观念已经深入人心（又被称为“自主创新”），加快了我国积累资本的速度。压低汇率对加快出口企业、进口竞争企业成长十分有益，剩余劳动力从农村走入城市为企业成长提供人力资源。

推动出口、压制进口是中国贸易顺差背后的根本原因。从短期来看，政府应减少贸易障碍，让更多的进口商品进入中国，提高人民生活水平。中国还应增加几种新型输入方式，例如教育服务业和旅游业。拥有大量外汇储备作支撑，中国应扩大奖学金和助学贷款计划，使得符合条件的中国人到国外接受更好的大学教育和培训课程。然而，若非为了生产目的，中国不太可能增加这种类型的输入，因此，这也仅是一种假想。

此外，中国应认识到以培育高新技术产业为目的的本土自主创新计划，其实质是将产品收入从消费者转嫁给制造商，这是一个不公平的机制。全球大多数本土自主创新方案，实施效果并不理想。它们催生的行业不具备国际市场竞争力。这表明大多数本土创新计划要么是被“边学边干”的观点误导，要么是出于对竞租行为的考量。这种误导还导致另一个不幸的结果，即强调外国对中国进口壁垒和侵犯知识产权的不满，加重了对中国出口贸易进行自卫性反击。鉴于最受保护的产业不会成长为最具有竞争力的世界级行

业，大多只是以此躲避国外竞争的竞租行为。中国可以做到既不弱化技术改造能力，又能大幅减少本土自主创新的规模。

从长远看，中国的根本任务是改革国有银行系统的垄断地位，将储蓄转用于国内投资。另一种异常现象是，在华外国私人银行面临的法律限制和针对经营活动的非正式禁令比国内银行少得多。如不对国内私人银行进行优化升级，将很难满足劳动力密集度比大型企业大得多的中小企业的融资需求。一个现代化、多元化的金融部门是确保中国储蓄资金过度外流，并保持快速创造新就业机会的方案之一。

中国应通过削减投资和促进消费实现消费性增长。消费主导的经济增长意味着较低增长率^①。投资率较低，则产能提高较慢。这一建议实则希望中国放缓实现工业化国家水平的步伐。这一有缺陷的再平衡建议是基于不加批判地使用 GDP 核算身份提出的，其中，国内生产总值等于需求各组成部分之和。建议的提出者没有意识到，当国内生产总值大部分用于消费，小部分用于投资，则仅能保证现有承载能力的充分使用，而不能保证生产能力的增长速度。在今后一段时期内，国内生产总值的水平，取决于投资下一阶段资本存量的现阶段资金数量。

中国要实现经济再平衡，要做到两点。首先不靠牺牲国内资本积累，而靠消除贸易顺差，增加消费。在 2011 年 4 月的情况下，中国政府应该不再依靠削减投资遏制通胀，而是快速使人民币升值。将人民币升值作为对抗通货膨胀的主要手段，意味着以接受暂时的高失业率来换取未来的永久性低失业率。这是因为，出口制造业通常比投资项目需要更多的劳动力。出口减少了 10 亿元人民币，会比投资项目上减少 10 亿元人民币导致更多的失业。将今日投资的钱用于拓展未来的产能，意味着未来创造的就业机会将获得永久性增加。中国也应降低进口壁垒，因为廉价的进口将刺激消费，帮助控制通货膨胀。

其次是改变投资方向，使出口型投资转向辅助人力资本形成、加快农村人口城市化的投资。城市化进程可以成为与出口行业同样重要、持久的增长动力（Woo 和 Zhang，2011）。中国要在百姓负担得起住房的基础上推进城

① 例如，Lardy（2007：10）写道，更期望看到增长途径是通过“降低国民储蓄率”，并降低“过高投资率”。后者是走上消费驱动增长路径的先决条件。

市化。过去 10 年间房地产业快速增长，不单体现出投机性需求，也体现出百姓被压制的住房需求和随着工业化、城市化进程高速发展体现出的住房需求^①。大量从农村来到城市的新定居者不符合银行按揭贷款要求，所以产生了许多投资者将已购买的多处房产租给务工人员，期望租金随着租房者收入的增长而增加。从这个意义上说，住房需求已经被投机者利用。

我们建议中国研究香港和新加坡的低成本公租房计划，建立一个国家住房计划，使新生定居人口在租房达 7 个年头后，可以享有以建筑成本价格购买这些住房的优先权。这种“未来的主人翁”模式的城市化，可防止投机导致的高空置率升级到不良贷款问题。中国能负担得起大规模的公共房屋计划，这是因为，在其他国家主要难题不是结构问题，而是土地成本问题，而在中国，土地多为国有^②。

四 实现共同繁荣所需的理智与情感

为了控制住保护主义情绪，在美国进行重要改革也是必需的。众所周知，通胀后，美国蓝领工人的工资在过去 20 年间几乎没有增长，这种停滞对保护主义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也将矛头直指全球化竞争的加剧。现实情况是，美国公司为雇用蓝领工人付出的越来越多，但并没有转化成工人实实在在带回家的工资。因为，随着劳动报酬的增加，不断上升的医疗保险费消弭了工资的增长。如果没有医疗保险的通胀，工人拿回家的薪水会因在过去 20 年中发生的技术创新创造高劳动生产率而出现显著增长。美国总统奥巴马使更多的工人团体享受医疗保险，但对控制医疗成本问题，他没有提出任何有力的实施办法。削减预算赤字和因此产生的贸易赤字将是一件难事，除非进行医疗改革，控制医疗成本。

美国和中国除了各自对贸易不平衡引起的全球性关系紧张有所作为外，双方也应该携手合作，防止削弱世界贸易组织的自由贸易体制。具体来说，

① 如果投机性需求是楼市炒高的主要原因，租金不会有大幅上升（因为投机性的投资者往往会租出空置房）。相反，2010 年 3 月，北京的租金价格比 2009 年 3 月上涨 19.6%。见《中国日报》“调查显示房价仍然过高”的报道，2010 年 5 月 12 日，http://www.chinadaily.com.cn/metro/2010-05/12/content_9839054.htm。

② 应该指出的是，住房建设是劳动力相对密集行业，而家居装饰是劳动力高度密集行业。

中国已经从 WTO 体系受益匪浅，但其并未主动起到应有的作用，推动多哈谈判向前发展。巴西和印度在贸易谈判中担当了发展中国家阵营领导的角色。2007 年 6 月在波茨坦举行的四国集团会议上（G4：美国，欧盟，巴西和印度），巴西和印度收回早期提出的制造业关税，以换取发达国家对农业补贴进行的削减，这些国家更青睐与中国进行进口贸易。

美国对保护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意志较弱，中国此时应在多哈回合谈判中表现更加活跃，进一步放开国际贸易限制。这种作用将非常符合中国的利益，因为巴西现在正绕过多边贸易自由化与欧盟进行自由贸易协定（FTA）的谈判。越来越多像巴西这样的国家对多边贸易慎而又慎，避免降低关税使像中国这样的低成本生产者从中得利，并不断寻求与发达国家签订符合双方利益的双边贸易协议。因此，中国作为一个负责任的利益攸关者，中国此时加入多边自由贸易体系正逢其时。

对世界经济而言，特别需要美国和中国在许多方面（如汇率政策、财政预算赤字、放松双边和全球贸易管制、遏制盗版行为、社会安全等方面）启动经济协调，使收支往来不平衡低于国内生产总值的 4%。如果两国不通力合作，在解决贸易不平衡问题上无法携手，那么我们不可能在短时间内看到两国在对全球气候变化的协议（多边），加强核不扩散或消除贫困等方面的新进展。总之，如果在贸易等争议较少的问题上不能充分运用外交界的政治智慧，则在那些更重要的目标上就无法取得进展。如果这些问题中的任何一个取得了进展，那也一定是在经历了充满对抗性的漫长过程之后才能得以实现。

高度对抗性的结果不一定就是获得进展，相互麻痹或公开冲突，也是对抗的常见结果。许多专家都指出，20 世纪的“强国”（前 50 年是德国和日本，后 50 年是苏联）与现在的“强国”都发生过灾难性战争。对中国，作为一个在 21 世纪出现的世界强国的悲情预测，忽略了一个事实，即在 20 世纪崛起的最强国是美国（而不是德国，日本或苏联）。美国是全球稳定的推动力量。总之，如果现在的各强国家能有技巧地（不是放任自流）容纳一个新兴的中国，中国有可能成为全球体系中一个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因此，我们不应放弃希望（这一点被澳大利亚国立大学 China Update 项目的分析师多次指出），中美能够从维护自身利益出发，做到认真合理地缓和双边紧张关系，确保一个充满希望的未来。

参考文献

Guha, K. (2009), “Paulson says crisis sown by imbalance”, *Financial Times*, 1 January 2009, < <http://www.ft.com/cms/s/0/ff671f66-d838-11dd-bcc0-000077b07658.html> >

Lardy, N. (2007), “China: rebalancing economic growth”, in F. Bergsten, B. Gill, N. Lardy and D. Mitchell (eds), *The China Balance Sheet in 2007 and Beyond*, Center for Strategic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and the Peterson Institute for International Economics, Washington, DC.

Scott, R. E. (2007), *Costly trade with China: millions of U. S. jobs displaced with net job loss in every state*, EPI Briefing Paper No. 188, 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 Washington, DC.

Woo, W. T. (2008), “Understanding the sources of friction in US-China trade relations: the exchange rate debate diverts attention away from optimum adjustment”, *Asian Economic Papers*, vol. 7, no. 3, pp. 65 – 99.

Woo, W. T. and Zhang, W. (2010), “Time for China to move from macro-stability to macrosustainability: making macro-stimulus work and maintaining its effects”, *Journal of Asia Pacific Economy*, vol. 15, no. 4 (November 2010), pp. 349 – 368.

(王宇 译)